

目 录

赴苏学习前后.....肖劲光(1)

五四运动前后的长沙——研究俄罗斯——到俄国去
——在苏联学习的日子——返回祖国到安源——参
加北伐

我所经历的一段往事.....许德珩(22)

参加延安“抢救运动”的片断回忆

.....李逸民(29)

“抢救运动”前的大好形势——中央作出审干决定——
不夜城的延安——第一个典型的突破——运动的歧途
和康生的火上浇油——和毛诚的一次交谈——终于想
起了马列主义——我也得到了“平反”——历史的教
训

我所知道的赤色革命互济会

.....黄静汶(44)

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前后的

一些情况.....张达志(59)

在法国、比利时勤工俭学的日子

.....江泽民(71)

秘密的岗位张克侠(85)

投笔从戎——北伐前后——赴苏学习——申请入党——在西北军——抗日同盟军——“七·七”事变——坚持抗日——难忘的会晤——随军转战——第三十三集团军——自忠中学——策动起义——再次见到周恩来同志——“守备”徐州——起义前夕——回到自己队伍——为革命事业而战

回忆在川陕地区的统战工作

.....武志平(133)

轰动一时的“神秘西人案”

.....于 生(156)

延安兵工厂的始末孙云龙(165)

智取大牙口

——贵州剿匪记实王耀荣(172)

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王子光(181)

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后期张持平(189)

• 来信照登 •

我对聂洪钧同志文章有些与历史

不符的说明程子华(192)

赴苏学习前后

肖 劲 光

五四运动前后的长沙

一九一九年，在那暗无天日的旧中国，外遭列强掠夺，内有军阀混战，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



肖劲光同志一九三八年在延安

张敬尧统治下的湖南，处在南北军阀混战“拉锯”的战场，兵祸、天灾，更是民不聊生。人民在苦难中呻吟，人民也在苦难中觉醒。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湖南一批革命爱国志士，在长沙组织了新民学会，创办了《湘江评论》等刊物，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强国富民的道路。毛泽东等同志的革命活动在湖南的青年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启发

了许多人的觉悟，对后来培养一批革命者起了重要的作用。

那时，我还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在学校里就曾读过毛泽东

同志写的诗和文章。长沙的学校当时有一成例，无论那个学校的学生，凡是文章做得好的，就拿到各学校去传阅。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就是这样在长郡中学传阅的。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大家非常感兴趣。他后来创办的《湘江评论》在学生中影响很大，给我的印象更深。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逐渐传入中国。在湖南教育界和学生中也开始出现新的民主革命的思潮，同时也夹杂着出现了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反动统治者对十月革命的影响十分惧怕，诬之为什么“过激派”，散布什么“共产共妻”等胡言。所以那个时候在知识分子中的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思想比较混乱。我记得长郡中学校长彭国钧在给我们讲修身课时，他突然表情严肃起来说：“现在世界上有这样一种思想，就是俄国的过激派。这些人说你的就是我的。这样的主张，你们赞成吗？”我们听了莫明其妙。他又说：“赞成的举手！”没有人举手。

“不赞成的举手！”零零落落的几个人举手。还有一个北大毕业的英文教员熊梦飞，他在上课前总是讲一些对当时现状不满的话。有一次他讲：“今天我来上课，在街上看到这样一件事，有人坐轿子，有人抬轿子，为什么会这样？这不公平！”那个时候，我们学生对旧社会的反动统治和腐败无能是非常痛恨的。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非常反动，残酷地镇压和迫害学生，无恶不作，我们恨透了。日本帝国主义欺侮我国，我们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在那种人吃人的旧社会，压迫剥削极其严重，我们就反对社会上的不平。那时我们还只是带着这种反帝、反军阀、反对剥削压迫的朴素的感情参加革命的。

五四运动点燃了湖南的革命烈火。很快在全省爆发了反日驱

张——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的群众性爱国救亡运动。开始在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发起反对丧权卖国的二十一条的示威游行，发出“请斩曹陆，以谢天下”的宣言。长沙全市的学校举行罢课、示威，焚毁日货，相继发起组织救国十人团。当时的救国十人团的宣言上是这样写的：

“呜呼！于兹乱世外侮日深矣，妻孥将受人淫辱矣，祖宗坟墓将被人掘发矣，财产将不复能保存矣，一身将为奴隶牛马任人鞭策矣！言念及此，莫不寒栗。此爱国之士呕心挥血奔走呼号，特倡救国十人团也。盖救国即以救家，救家即以救身。苟吾国民痛定思痛，养其浩然之气，立其不拔之基，由一团而十团，十团而百团，百团而千万团，合全国之无数小团而成为一最大之团，同心一德，力御讎仇，则会稽之耻固不难雪也。”

在学生们的影响和推动下，长沙各界人士纷纷响应。反日爱国运动在全省迅速展开。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上什么课，都是罢课游行，上街进行宣传，声势是很大的。

军阀张敬尧对学生的反日爱国运动非常害怕，疯狂进行镇压和迫害，以武力解散学生联合会和救国十人团。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反日爱国运动即转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了。

毛泽东同志等新民学会会员积极领导和组织了这一群众运动。利用湖南军阀谭延闿、赵恒惕与北洋军阀张敬尧之间的矛盾，联络各界人士，组成驱张代表团，奔走于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地，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发表驱张宣言。长沙全市学生举行总罢课，发布了“张毒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宣言。驱张运动，获得京、津、沪、汉等地学生团体和报纸舆论的支持。这时，张敬尧已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再加上军事上，

湖南军阀的部队步步逼进，迫使张敬尧率部逃出湖南，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获得胜利。这一斗争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湖南学生和爱国人士的斗志，湖南的革命形势也向前发展了一步。

研究俄罗斯

驱张之后，湖南的民主空气稍有活跃，谭延闿借机上台，伪装支持学生驱张运动的面孔还没能一下就改变过来，因此短暂的一段时间内，湖南的形势是比较有利于革命斗争的开展。此时，毛泽东同志从上海返回湖南，联络一些进步人士创办了文化书社，大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出版马列书籍，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回击社会上的反动派对苏联共产党的攻击和诽谤。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之前，中国的革命者从辛亥革命起，一直在寻找中国复兴的道路，但没有找到。列强瓜分，军阀混战，贪污腐化，盗贼横生，使国家到了亡国的边缘。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工农当家作主，一洗过去沙皇俄国留下的污秽，露出了崭新的面貌。不仅在国内打败了十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粉碎了无数起白匪军的反革命暴乱，而且在国际上首先宣布废除过去帝俄时期与中国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把帝俄掠夺中国的一切权利，无代价地归还中国。在国内宣布土地全部收归国有，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工人农民获得彻底解放。这一切，给了当时处于徬徨的中国革命者以极大的吸引力和巨大鼓舞，在徘徊中找到了出路，在迷茫中见到了光明，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这是当时有志之士的理想和方向。北京、上海、天津、长沙的报纸和刊物不断地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引起了青年学生们的极

大注意。

一九二〇年夏天，学校放暑假。这时，我和弼时同志由于家境贫寒，为节省一点路费，就没有回家，仍然住在学校里。同时，也为即将毕业后的出路苦恼着，寻找办法。原来我们想去法国勤工俭学，但第一批已走，第二批再也没有组织，机会错过。正好这时毛泽东同志和方维夏等同志筹办俄罗斯研究会，酝酿组织赴俄勤工俭学。方维夏同志当时思想进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我那时是个学生，并不认识他，北伐开始时，我到了广东才认识他。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党代表，李六如同志任第四师党代表，我任第六师党代表，逐渐熟悉起来。北伐到武汉后，我常到他家去。从武汉分手后，再未见过面。后来他在湘赣边区牺牲了。俄罗斯研究会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发起筹备，并推举毛泽东同志任书记干事。俄罗斯研究会是“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会务有三：“一、从事关于俄国一切事情之研究，以研究所得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后，除长沙的报纸外，北京、上海的报刊也作了报导并发表文章为之欢呼。

俄罗斯研究会的成立，使我们有了希望。一天，弼时同志从街上回来，看到我高兴地说：“有办法了！有办法了！”我问他有什么办法？他说：“到俄国去！”我听了后十分激动。原来，他认识的一个同乡叫任岳，在船山学社学习，那时船山学社是长沙革命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我们通过任了解到俄罗斯研究会的情况，决定参加，随即通过船山中学校长贺明范的关系，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填了表。记得在俄罗斯研究会，毛泽东同

志还搞了好多个题目，准备系统地介绍俄国革命的情况。还组织过一些报告会和讨论会。俄罗斯研究会的成立，加强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介绍了共产主义的理论，传播了马列主义知识，这些活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到了积极作用。

俄罗斯研究会积极组织留俄勤工俭学。毛泽东同志送走了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人员之后，就考虑改送去俄国勤工俭学。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就曾谈到留俄之事。俄罗斯研究会第一批组织了六个青年学生去上海学俄文，准备赴俄勤工俭学。这六个人是任弼时、任岳、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和我。当时，我们只差几个月就要中学毕业了，我和弼时同志商量，决心不要毕业文凭了，到俄国去。一九二〇年夏天，我们离开了湖南，来到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六号一个由海参崴华侨头头杨明斋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杨明斋是第三国际派来的。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可是与第三国际已有联系。在外国语学社除学俄文外，一个星期还讲一次马列主义，由复旦大学教授陈望道讲。我读的第一本马列的书就是外国语学社发的《共产党宣言》，是由陈望道翻译的。书的封面上有一个大胡子的马克思像，我们读起来，字都认得，但好些术语不明白。

到上海后，我和弼时同志一起参加了毛泽东同志等二十六人在上海发起的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团的一个机关所在地就在俄文班的楼上，刘少奇同志是我们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比我们先到上海，后来与我们在一起学俄文。工读互助团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参加这个组织的人除学习、工作外，还积极参加当时的一些政治斗争。上午我们学俄文，下午有时刻钢板、印传单，有时到工厂联络，作些宣传工作。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

行，在前面举旗杆的多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几个娃娃住在法租界菜市路一个亭子间里，吃最便宜的包饭，生活是很清贫的。但是我们的学习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到俄国去，学习革命道理，回来搞革命，改变落后黑暗的旧中国。所以，我们学习俄文，都很用功，很刻苦。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我们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即转团，我和少奇、弼时同志都是在一九二〇年冬天第一批转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过去一个时期关于入团的时间我只记得是冬天，究竟是一九二〇年冬还是一九二一年初，记不太清楚了。后来我问过任弼时和刘少奇同志，他们都说是一九二〇年。我们在上海学习了八个月的俄文后，于一九二一年初，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介绍，通过杨明斋的关系，就开始分批动身去俄国。一起去俄国的除我们六个人外，还有先后到上海来的刘少奇、彭述之、罗觉（罗亦农）、卜士奇、吴芳、任作民、廖化平、谢文锦等。

到 俄 国 去

那个时候到俄国去很不容易，不仅有个路费问题，而且还要通过许多关卡，稍一不慎，就会被捕。我们从上海乘船，经日本长崎到了海参崴。当时，海参崴还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之下。苏联远东边疆地区有的被日本占领，有的在白党匪徒的手里。当时苏联红军已控制了伯力。海参崴与伯力之间有一条伊曼河是分界线，河这边是“白区”，河那边是“红区”。通过这一地区要经过日本人和白俄的盘查，还要摆脱军阀张作霖在海参崴的总领事馆的监视。我们到了海参崴之后，住在一个小旅店里，少奇、罗觉、吴芳等几个负责人与海参崴大学教授伊凡诺夫接上了头，从此一切到伯力的手续和行程都是由他们安排的。我们在小旅店里

住了几天，天很冷，十多个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当时海参崴地区发生鼠疫，凡是住旅店的进出都检查得很严。张作霖驻海参崴总领事馆对我们的来去很注意，他们知道我们的姓名，从哪里来的，误认为我们是孙中山派到俄国去的代表，抓了刘少奇、吴芳等同志去审问。听说在审问时搞得威风凛凛，戒备森严，两边站的是刀枪手，就像唱京戏那样。领事馆的人问少奇他们是干什么的？少奇同志沉着地回答说：“是做裁缝的。”因为当时南方人跑到北方来大多是做苦工或者是做裁缝、理发等手艺活的。少奇同志是湖南人，讲湖南话，他们也听不太懂。不管怎么问，少奇他们只讲是学手艺的。审问没有结果，威胁了一顿，就把少奇、吴芳等放回来了。少奇同志回来后，讲述了审问的情景，神态自若，他那勇敢机智、临危不惧的精神使我们钦佩。总领事馆虽然放了他们，但并不死心，还通知驻伯力的领事馆注意我们。但是伯力已是苏联红军管辖之地，等我们到了伯力后，他们也就无能为力了。

从海参崴到伯力时，我们十多个人分为若干个小组，我和弼时同志两个人为一个小组。我们一个扮作裁缝，一个扮做理发工人，路上还装着互不认识。我和他从海参崴出来一路还算顺利，但在通过红白地区交界时遇到麻烦，日本人和白匪盘查很紧。我侥幸通过了，任弼时同志却被以“鼠疫患者”的嫌疑为白匪扣留了。我十分耽心他的处境，但又无能为力，只好只身来到伯力等待他能脱险到来。过了两天，任弼时同志果然以他无比坚定的意志和沉着冷静的态度，巧妙地通过了白匪的盘查，脱险来到伯力。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样的一个遭遇，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原不算是稀有的事，但对那时只有十

七岁的一个青年来说，也可以说是一次大的考验。弼时同志所表现出来的坚毅的革命精神和镇静机智的性格，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以后三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他虽历经敌人的酷刑威迫，却始终如一的表现了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情操和高贵品质，这不是没有基础的。到伯力之后，一切都由苏联红军接待，吃住都有人负责，心情一下子舒畅了。我们自由了，再也不用化装和躲躲闪闪了，那种担惊受怕的情绪消失了，大家再不装做互不认识，而是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在苏联看到的一切。虽然生活是艰苦的，但精神非常愉快，开始体会到解放了的滋味。我们在伯力等了几天，集中了十个人左右，然后继续前去莫斯科。由伯力到黑河，分为两路，一路乘船，一路乘火车。我和少奇同志乘船，弼时、罗觉等坐火车。从伯力到黑河这条航线也不太安全，因为船在黑龙江上行走，有时走中国水域，有时走苏联水域。在中国水域时，有时还会遇到鸣枪停航检查，但苏联船上的人对这一套都熟悉了，有办法对付他们。一路上，少奇同志和平时一样很少讲话，遇事非常冷静沉着，在他的神态中蕴藏着一种说不出的力量。到了黑河，仍由红军接待，黑河红军的司令是一位老太太，华侨也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武装支队，打仗很勇敢，红军很信任他们。在黑河没有住几天，水旱两路人员集中后，我们又继续向莫斯科前进了。

从黑河到莫斯科，我们都乘火车，一路上，亲眼目睹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经历的极其艰苦奋斗的情景。苏维埃政权刚诞生不久，就遇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的破坏和后来连续三年的外国武装干涉与白党匪徒的反革命暴乱，七年的战争把苏联的国民经济弄得穷竭不堪了，

新生的苏维埃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我们到苏联的时候，苏联政府和人民已经以极大的代价和牺牲赢得了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白匪武装暴乱的伟大胜利，战争已接近尾声，但是战争的创伤却历历在目。工厂、矿山遭到严重破坏停产了，农村遭受兵祸，被洗劫一空，天灾人祸，粮食欠收，人民贫穷不堪，各种物资极其缺乏。到处都是弹痕累累，道路桥梁被破坏得不象样子，全俄处于普遍饥荒之中，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路旁。火车没有煤，要烧木柴。当火车停下来时，我们就下车冒着严寒去搬运木柴，一路上边走边还要边与白匪的破坏作斗争，走一段就要停下来修铁路，边走边修。就这样从黑河到莫斯科，一直走了三个月。即便是在这样一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苏联人民没有被吓倒，他们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以极大的革命热忱和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精神，团结在列宁和党的周围，咬紧牙关，英勇奋战。在困难的情况下，从上到下都过着艰苦的战时共产主义生活，团结一致共同渡过难关。苏联人民而且具有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尽管他们自己那么困难，但对我们这些外国人却极其友好，生活上给予和红军一样的优待。战争结束后，列宁又马上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由于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正确，从一九二一年起，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就扭转了经济困难的局面，治好了战争的创伤，取得了经济恢复的伟大胜利。这说明一个政党路线正确，能够实事求是的制定正确的政策，就可以调动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奋斗，任何困难都是可以战胜的。

一九二一年，我们到达莫斯科时，正逢共产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们被分配到会议代表们住的一个旅馆里，有时开大会作报告，也发票给我们去旁听，因此我们也参加过一、二次会

议。这次代表大会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主持的。在听报告时，见到列宁在主席台上，但距离比较远。过去有的同志问我在苏联见没见过列宁，我都说没有见过，因为我觉得那时只是远远的看见过，如果跟别人讲见过，似乎会使人觉得是吹嘘，所以我就说没见过。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时，我们在东方大学学习的远东各国的学生均推选人员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参加守灵，我被选为代表在列宁的遗体旁守灵五分钟。

在苏联学习的日子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即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东方大学是一九二一年五月成立的，它的全称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共产国际一九二〇年七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列宁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指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方向，并首先提出十月革命后的民族民主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范畴。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于一九二〇年九月又在巴库召开了一次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在这种形势下，莫斯科成立了东方大学，这是一所政治性的学校，来学习的大部分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也有一部分是远东各国来的学生，有中国、日本、朝鲜等。名誉校长是斯大林。我们在中国班学习。我们来东方大学之前，瞿秋白和李宗武已经先来到这里，他们是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到第三国际来的，后来就到了东方大学。我们来了之后，他们还给我们当翻译，那时，他们既不是团员，也不是党员，瞿秋白同志是一九二二年在旅俄支部入的党。东方大学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和俄文。记得有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波格丹诺夫的

政治经济学，还有《共产党宣言》、关于工会运动的小册子等。当时共产国际对工会中的工团主义批判得很厉害，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学习中也批判工团主义。我们那时都是一帮娃娃，没有什么革命的实践，只有一股革命的热情和寻求救国道理的愿望。我们亲眼看到革命后的苏联的新气象，感到什么都好，都很新奇，与旧中国那种军阀混战、列强瓜分、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相比，完全是另外一个天地，所以学校安排什么，我们就学什么，求知欲很强，总想多学一点，回国后能用得上。

一九二二年一月，在莫斯科举行东方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叫远东劳动代表大会）。我们在东方大学学习的部分学生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大会，担负大会的一些文书工作。瞿秋白、李宗武、卜士奇给大会作翻译，我和少奇、弼时都是大会的工作人员。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有张国焘、柯庆施、张太雷等。

东方大学开办时，苏联党内对于殖民地革命问题也是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最初，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观点曾对东方大学有很大影响，因为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的总书记，托洛茨基是红军的总司令。他们认为中国革命还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是军阀统治，民族资产阶级微乎其微，中朝等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谈不上直接革命的问题。开始，我们方向很不明确，既然中国不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那我们搞什么呢？季诺维也夫等人认为，东方大学不是培养职业革命家，而是培养以社会职业为掩护的地下工作者，所以曾经在一个短时间内，要把我们培养成医生什么的，说中国不存在职业革命家。

另一种是列宁的观点。他提出了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的问题。列宁分析了殖民地革命的形势，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形成了一个阶级，阶级斗争是激烈的，在殖民地国家里组织苏维埃是可能的。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说道：“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他相继提出农民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统一战线问题、革命的性质问题，需要有一批职业革命家。因此，就在我们这批学生中选了四个人（我、任岳、周昭秋、胡士廉）到苏联的红军军事学校学军事。这是一所初级军官学校，训练排长的。我们学了一年多，后来，陈独秀来到苏联，知道我们在那里学军事，就把我们骂了一顿，说什么现在中国的形势不存在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你们学军事干什么，想当军阀呀！就这样把我们四个人又骂回了东方大学。不过我们在军校的学习也基本上学完了。所以我在东方大学是学了两头，开始学了一段，后来又学了一段，中间在军事学校学了一段。这场争论，直到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连续不断地展开了罢工斗争，爆发了“二七”大罢工之后，才算基本结束。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的巨大力量之后，实践证明了列宁的观点是正确的，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的观点是错误的。

到东方大学来学习的除了我们这一批从上海外国语学社来的外，后来又陆续从国内来了一些人，如曹靖华、蒋光慈、魏素园等，他们学的是俄罗斯文学。到一九二三年，赴法勤工俭学的一些人陆续分批的从欧洲来到东方大学，象赵世炎、陈延年、陈乔

年、肖三、王若飞、袁庆云、余立亚、高风、郑超麟等。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当时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是一些骨干，他们到了东方大学后，对旅俄支部党的活动有很大的加强。

一九二一年冬，东方大学中国班开始建立党的组织。我们进东方大学时一些同志曾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党还没有成立，我们到了苏联后，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那年冬天，刘少奇、彭述之、罗觉、卜士奇等先转党，尔后由他们这几个党员和我们这些团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我们这些人是以以后陆续转党的。弼时同志是一九二二年初转党的，我是一九二二年底转党的。团员转党时，要有两人介绍，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支部大会开会时党团员都参加，通过党员时，党团员都举手。旅俄支部是东方大学总支领导下的一个支部，我们是中共党员同时也是联共（布）党员，发的是联共（布）党证。旅俄支部早期负责人是刘少奇、彭述之、罗觉、卜士奇等。此外，东方大学还有俄罗斯东方少数民族支部，日本支部、朝鲜支部等也是在东方大学总支的领导之下。在旅俄支部入党的还有瞿秋白、李宗武。

在苏联学习这一段，正处于苏联国内经济困难时期，生活是很苦的。同时，还有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捣乱破坏，所以我们白天学习，晚上要在街上站岗，星期天还要做工。凡是站岗的，一个星期发给半斤到一斤黑面包，有的面包上面都长了绿霉，有的里面有一段绳子，把绳子扯出来，面包中间就成了一个大洞。当时，在苏联最好的待遇是红军，列宁也只是享受红军待遇，我们这些外国学生是受优待的，也享受红军的待遇。那时每天供应我们的是什么呢？只有一块象两个手掌合起来那么大的

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早上切一块面包，中午就不敢切了，否则晚上就没得吃了。中午吃饭时有一个汤，是海草和土豆煮的，有时放一点咸鱼，开饭时一人一勺，一勺子下去有什么算什么，基本上是清汤，有时碰到一点稠的，算是很幸运了。我们的课堂在四层楼上，象我们那时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平常情况下，上个四层楼算得了什么，可是那个时候上四层楼真困难啊，一步一步慢慢的往上挪，中间还得休息几次。有时肚子饿得实在不是味道，就躺在铺上等饭吃，越等越饿。我们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欧洲工人阶级捐献的，皮鞋是英国工人捐献的，不管脚大脚小，一人一双，皮鞋重得很，穿起来大一截子，鞋尖向上翘起。冬天穿一种很薄的麻布做的黄色衣服，一人一件军大衣，一条皮带，一顶尖尖的帽子，上面有一个红五星。晚上房间里烧木柴取暖。大家一个挨着一个，睡在一起，只盖一件大衣和毯子，那时年轻，也不大怕冷。在苏联那个时候，大学教授的报酬也就是一块面包。大学教授背个兜兜，每星期六拿发给的面包票去领一块象牛屎一样的黑面包，放在兜兜里背回家，这就是一个星期的报酬，也没有什么钱。到一九二三年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后，我们在军事学校学习，一个星期才可以吃到一点酥油，领到一点白糖。陈独秀到苏联后，第三国际还特意慰劳了我们一下，给我们每人发了半斤米，一斤土豆，半斤咸猪肉，还发了点白糖。于是，我和任弼时、任岳、周昭秋四个人凑在一起，拿了一个盛开水的罐子，把东西放在一起煮了，然后提到四层楼的课堂里吃了一顿，来了一次大会餐，真高兴极了。在那个困难的日子里，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中也有人受不了那个苦，提出要回国。我们去的这些人尽管生活很苦，但从未提出要提前回国的问题。为了寻求革命